

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水平的再认识

林 枫

(厦门大学 经济研究所,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从商业定义出发,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水平很高;但从商业功能的角度出发,为扩大再生产服务的商业还相当有限,为简单再生产或生活消费服务的商业仍是商业形态的主体,商业在实现资源配置、协助完成生产过程等方面的作用相对弱化。这种“繁荣”的商业实际上是一种低水平的商业,它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作用。

[关键词]明代中后期;商业水平;再认识

[中图分类号]K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3)04-0043-09

治明、清史者往往明清史兼治,因此在研究时段和研究对象上容易出现明清并论的倾向,在商业发展水平这一问题上也不例外,“明中期而后”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商业发展的一个似乎没有变异的一以贯之的完整时期,明中后期与清中前期在商业水平上的差异常常被忽视。不可否认,明代确实是中国传统社会商业发展的重要阶段,尤其是嘉万时期,商品增多,市场扩大,商人活跃,商业十分繁荣。然而,在繁荣的背后,却蕴涵着有别于清前期的落后的商业形态。本文从商业定义和商业功能双重标准出发,对明中后期的实际商业水平进行评价,并藉以引起对商业于社会经济之贡献的思考。

商业的定义

商业是专门组织、从事商品交换的行业行为,是必须有商人参加的经济活动,商人先垫付一定数量的货币资本,作为买方买进货物,而后又作为卖方卖出货物,收回货币,完成“货币——商品——(增殖了的)货币”的商业过程。小生产者进行的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商品——货币——商品”,为买而卖,有别于真正的商业行为。商人追求利润(货币、价值),小生产者追求使用价值。为卖而买,是商业的首要特征;贱买贵卖,则是商业利润的源泉。

因此,判定商品之为商品、商业之为商业的

关键是商人的参与。地主、农民直接出卖给消费者的粮食不是商品,只有经商人转卖的粮食才是商品,无论这些粮食是否为了出卖而生产。棉布无论是由手工业者专门生产,还是由农家副业生产,无论为生计所需,还是为追求利润,商品布的属性都是由商人行为所赋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城市商业与墟集贸易。城市人口集中,消费性特征显著(工商业城市或政治功能为主的城市皆然),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铺坊加工业等最为发达。或谓城市商业是城市人口以其收入购买消费品的交易,是农村往城市的单向流动,不是真正的商品流通。城市所需,一部分由不在地主、国家租赋收入之实物提供,也有近郭农民、小生产者的直接入城出卖,但更多的部分则是由商人组织的商品来补给。商人收购各类物资,入城销售,完成了商品流通的完整程序,城市商业是商品流通的最重要环节之一。

吴承明先生提出“广义自然经济”的概念,即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其农副产品存在差异性,他们在墟集上进行品种调剂、余缺调剂,完成使用价值乃至劳动的直接交换,互相取得原料或产品以完成再生产。只要这种交换通过商人,就应该算作商业活动。也许这种商业最重要的用处只是作为家庭小农业、小手工业生产的补充,这种商业的发展也未必会促进社

[收稿日期]2003-06-29

会经济的进步。但墟集商业是长途贩运商业商品集散的出发点与目的地,也是全国性商品大流通形成的基础。

从商业定义出发对 商业水平相关因素的描述

从商业定义出发,我们可以认为,传统社会的商业水平,实际上就是市场上商品购销数量与金额所能达到的位阶。对某一分省区而言,生产水平决定了当地产品的自给程度,例如,经济作物种植与相应之加工手工业都很发达(或不发达),原料的自给程度就很高,若二者之间悬殊大,则容易发生原料的输入输出;外地商品输入,依赖于当地的购买力水平,购买力源自本地输出商品所得及其他来源(如商人、手工业者的收入等);交通条件是购销活动最重要之相关因素,交通不便之处,购销因成本加大而难以实现。此外,城镇、专业化生产区域、军队驻地等,集中了庞大的消费群体,有着大量的生活资料需求;专业化生产区域(包括以手工业生产为主的工商业城镇)往往在区内区外进行大规模的原料、产品交换;对外贸易(包括海上贸易、边境互市)发达地区,大批商品进口而后分销,或集中而后出口。以上因素结合在一起,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区域商业发展水平。

一、北直隶

入明以后,北直隶人口增长,耕地拓垦,经济有所发展,但速度缓慢。本区基本上是单一粮食作物的生产,以小麦为主。耕地主要集中在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的山麓平原、中部平原,山麓平原土肥水足,生产条件优越;中部平原土地贫瘠,灾害频仍,广种薄收,井灌逐步发展,作物单产有所提高。农业不发达,粮食仅足自给。明中后期,蚕桑衰落,棉作发展,棉纺织业也随之发展,(河间府)肃宁布享誉北方,产量不低,“足当吾松十分之一矣。初犹莽莽,今则细密,几与吾松之中品埒矣”。棉花商品化程度不高,自植棉、自纺织的家庭副业占大部分。

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也是最大的消费城市,不仅有庞大的官僚队伍和驻军,还有家属以及提供各种服务的各种人员。除了各地大量的粮、盐、布、丝等实物贡赋供应外,还向市场购入大批物资。宣府、蓟州是重兵屯驻之地,边镇驻军

24万余人,岁拨饷银355万余两,具有很强的购买力;宣蓟也是互市之处,边境商业活跃,宣府之大市“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腺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

二、山东

山东主要粮食作物为小麦、大豆、杂粮。鲁西平原资源条件好,小麦面积明显增长,夏播大豆日渐普及,麦—豆—秋杂两年三熟制开始出现,大批余粮外销。山东半岛多盐碱沙磧地,耕获瘠薄,但地旷人稀,尚有余裕,输出以大豆为多。鲁中山区,嘉靖中尚为荒蛮之地,万历后设立官庄,促进开发,但地少且瘠,丰年亦难自给。“齐鲁诸道,丞民粒食,小麦居半,而黍、稷、稻、粱仅居半。”杂粮种植广泛,多充民食,使小麦输出量更大。

山东棉作普及,有40余个州县植棉,出现了运河、大清河沿岸的东昌、兖州、济南三大集中产区,东昌为最,“高唐、夏津、恩县、范县宜木棉,江淮贾客列肆赍收,居人以此致富。”济南府临邑县曾有植棉千亩之家,濮州更有万亩之家。棉纺织业是鲁西北、鲁北最普遍之家庭小手工业,济南府历城县、东昌府濮州、青州府临朐县,皆有棉布出产,兖州府定陶县“所产棉布为佳,他邑皆转鬻之。”相对落后的棉纺织业,使有余棉外运江南。登州府亦纺织普及,惟其地不产棉花,输自江淮。棉纺织业专业化不足,且有繁重之军用棉布征调(每年数十万匹阔布),棉布主要靠江南输入。

丝织业、皮毛加工业、果品加工业等发展较好。鲁西为主要丝织品产区,兖州产镜光绫、双距绫等高级织品;临清有机房百余家,帕幔行销颇畅,京师、开封、宣府等处有专门店。生丝多自江南、河南来。羊毛加工是皮毛加工业之主业,东昌、兖州皆有毡毳之利;临清羊皮、织绒、毡罽等量多质精;胶州毡帽颇有名气。果树种类多,产量高,东昌、兖州之枣梨最为著名,行销最广;青州柿饼、核桃次之。果品加工业多为果农自家制作,以熏枣产量最大,销路最广。小麦主产地滕县等皆有商人购麦踏曲,发展酿酒业;陶冶业,最著者有临清之砖、颜神镇之陶。

山东西部属华北平原,地势低平,河网交

错,藉运河贯穿南北之便,与南北直隶、河南等地区沟通。东部山东半岛山地丘陵与平原盆地相间,沿海多港湾、岛屿,海运便捷,与江淮、渤海湾北岸多有来往。中部山地隔断东、西部往来,造成东、西部与外部交流,中部区内外分离的格局。

济宁、临清地居入京孔道,张秋镇为大河、运河交汇处,三地发展了中转贸易,成为重要商业城镇。临清是北方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有布店 73 家,绸缎店 32 家。张秋,廛以数百计,街巷数十条,专业街市二十七、八个。它们人口众多,商品需求量大,临清、济宁岁输入粮食 100 万石以上。

三、山西

山西山多土瘠,可耕地少,气候寒冷,灌溉缺水,晋西黄河流域各县又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产条件差。全省实行单一农业生产结构,基本上只种粮,经济作物少;粮食作物又以低产之稷黍为主,小麦种植不广,产量低,不足以食。

手工业生产进步明显,采矿、冶炼、丝织、陶瓷比较发达,但棉纺织业落后,需要输入棉布。产煤州县 20 余个,产铁州县 31 个,生铁年产量在 900 万斤以上,阳城为北方最大的冶铁中心,年产 50、60 万斤,太原府、大同府、(汾州)平遥县铁冶业也比较发达。潞安府为著名丝织业中心,长治、潞州卫、(泽州)高平县有绸机 13 000 余张,年产潞绸 10 万匹以上;太原、平阳之绌,平阳、潞安、泽州之帕,均著盛名;生丝供应仰赖江南。汾州介休县洪山村瓷窑,所产贩运全省。

晋人多从商,汾州府“民率逐于末作,趋利如鹜”,平阳府“土狭人稠,每挟资走四方”。主要从事盐、粮、布、丝等大宗长途贩运和转售贸易,获利甚巨,“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山西、大同两镇岁饷达 200 万两之巨,形成庞大的军事消费区。偏关,“迨有明中叶,益兵增将,络绎于道,营帐星罗棋布,饷用既饶,市易繁盛,商贾因此致富者甚多。”^⑩隆庆和议后,边境互市发展,大同商贾辐辏,“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⑪

四、河南

豫东属华北平原,是良好的旱作区域,小麦播种面积不断扩大,有余裕输出;伊洛平原是本

省主要水稻产区。植棉普及,不少方志把棉花载入物产,“中州沃壤,半植木棉。”^⑫棉纺织业是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分布广泛,但仅作为家庭副业存在,“兰阳之阳地平沙,比岁多种木棉花。秋风吹破絮如雪,采采盈篮日色斜。准拟重襦可御寒,隆冬人儿衣不单。纺织才成更鬻布,漫说蜀郡歌五袴。田家愁叹欲何如,春来依旧早耕除。”^⑬棉布产量不大,本省田赋实征棉布 235 850 匹;城乡居民又多以棉布为衣饰,所产不足为用。棉花输往江南,棉布回运河南。豫西南山区(南阳府)有流民开垦,果树甚多,果品外销。

开封是繁华的商业城市,店铺林立,客商如云。《如梦录》详细记载了三街六市的盛况,但凡衣食玩好诸色用品,无所不有,仅梳子店就有三巷,每巷三二十家。除开封外,初级市场的发育也比较显著。集市数量增长,嘉靖中的二十个州县就有集市 227 个,平均每州县 11—12 个。集期逐渐固定,或 5—7 日一回,或 10 日三回,有的每月 1—2 回。^⑭

河南还是王府麋集之地,每年支給王府禄粮 268 400 余两;官吏师生之俸粮、各卫军士之补支、孤老之月粮等又 13 万两。^⑮

五、陕西

陕西粮食生产存在区域内部差异:关中地区属渭河平原,土地平衍肥沃,水利兴举,垦殖率高,农业生产水平居西北之最;陕北黄土高原区,因过度垦荒,地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自然生产力下降,产量很低;秦岭山区,虽经流民开发,仍与汉中盆地同属后进之列;西北部陇中地区,经过大规模屯垦,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已基本实现军粮自给。

经济作物以棉花为重,关中为棉花主要产地,95%以上的州县植棉。武功县,“地东南大宜木棉桑”;渭南县,“河北随地皆种,东乡尤宜”。^⑯但面积小,单产低,总产不高。手工业落后,兰州绒褐尚值一提。西北军用花、布多采办于关中,全省岁需军用棉布 588 999 匹、棉花 270 033 斤,不足之花、布再采买于外省,每年仅河南就供应棉布 4 万匹。

延绥、宁夏、固原、甘肃各镇不但有大量的军需要求,而且与耕牧于河套的蒙古吉囊等进行互市贸易。边境线长,互市地点多,交易频

繁,仅投放于九边官市的市本、抚赏金,隆庆5年10.8万两,万历12年100万两,万历末年达到200万两。

六、南直隶

苏北(淮安府、扬州府)以粮为重,盐碱地得以有效治理,双季稻又在江淮间取得成功,可以有少量余谷输出。苏南(苏州、松江、应天、常州、镇江五府)粮食生产条件优越,但棉桑夺地,口粮不足,得从苏北、长江中上游等地输入。

经济作物种植业发达,棉花、蚕桑首屈一指。松江府太仓州一带沿海沿江地段的植棉业、宁镇丘陵的蚕桑业,最为典型。手工业发达,棉纺织业、丝织业居全国前列。苏松是棉布主产区,技术先进,产品种类丰富,有标布、大布、斜纹布、飞花布、官机布等名色,产量很高,仅松江一地岁可2000万匹。苏州、南京是丝织业中心。苏州东北半城集中了大批独立机户,纺、织分离,分工日益细密,达到很高的生产水平。棉作、蚕桑相对于纺织业的落后,造成棉花、生丝输入。苏州生丝多来自湖州;松江有1/4以上的原料缺口,华北、湖广、浙江皆为其供应地。手工业生产工具需要铁器,输自闽广。

苏州、南京是繁荣的工商业城市;扬州是两淮盐业中心;朱泾镇、枫泾镇是棉布生产地与集散地。南直隶,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活跃的工商业活动致使为数甚巨的人口无法自给基本消费品。

七、浙江

太湖流域(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地理环境优越,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原来是著名的水稻产区,“太湖熟,天下足”。但明中叶后,多改田为地,发展蚕桑、棉作,所产粮食遂不足供食,如嘉兴府,“田收仅支民间八个月之食,其余月类易米以供。公私仰给,惟蚕息是赖,故蚕月最重。”^⑩其他地区粮食生产比较稳定,自足之余,可以调剂本省余缺或外运福建。

经济作物种植业发达,蚕桑、棉花、蓝靛、竹木种植普遍。蚕桑生产集中于杭嘉湖地区;棉花以宁绍、温黄平原为最多,余姚“浙花”著名;严州产木材,宁波产蓝靛。手工业发达,缫丝、丝织业居全国之冠,榨油业有特色。湖州桑树栽培技术高,养蚕技术精细,缫丝技术进步,生丝质量优良,产量大增,虽本区上纳税丝多,湖

州826262两(嘉靖元年),嘉兴次之,杭州684616两(隆庆6年),仍“湖丝遍天下”,供应各地丝织业。丝织业工序精细,产品花色品种多,双林镇包头绢、菱湖镇水绸、濮院镇之绸、杭州之纱罗,为其佼佼者。(湖州)归安、乌程,(嘉兴)崇德、桐乡,(杭州)海宁、临安、仁和,是主要丝织基地。(崇德)石门镇榨油业发达,油坊数十家,从业者数千人。本区棉布生产普及,但产量不大,基本上是农家自给性生产。

杭州在万历中达到空前繁荣,既是丝织业中心,又是杭嘉湖商品集散中心。店舍毗接,商品充斥市场,丝绸、米粮、棉布、百货为交易之大宗,“舟航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贸迁,珠玉象犀,南金大贝。侏儒雕,诸蕃毕萃,既庶且富。”^⑪此外,乌青镇、双林镇、菱湖镇是丝织业生产与集散中心;太湖流域是蚕桑业与丝织业专业区域。

八、江西

粮食生产发达,是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鄱阳湖平原属冲积平原,土层深厚,肥力较高,主要种植水稻;抚州多丘陵,米谷生产比较发达,杂粮适量种植;赣州在明中叶得到开发,丘陵山地因地制宜,修筑大量陂塘,以各种形式提水灌溉,加速梯田垦殖;吉泰盆地也是著名粮仓。江西粮食自给之外,大量余谷外运江浙闽广等地。

经济作物种类不多,数量不大,苧麻种植最广。赣州是省内经济作物最发达地区,蓝靛远销西北,“西北大贾岁一至,汎舟而下,州人颇食其利。”^⑫铅山纸业、景德镇瓷业居全国之首,麻纺织业是最普及之家庭手工业。景德镇在明中后期蓬勃发展,成为全国瓷业中心,“其所被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而商贾往往以是牟大利。”^⑬广信府铅山县槽房林立,纸品产量很高,跻身于全国五大手工业中心之列。农产品加工以麻纺织业为主,但并非专业化生产,而是服务于农家自给衣料,棉布需求因此下降。

江右多贾客,“南昌、丰城商贾工技之流,视他邑为多,无论秦楚齐蜀闽粤,视若比邻。浮海居夷,流落忘归者,十常四五。”^⑭行踪遍及全国,经营范围广,但多小本买卖,财力有限。赣江、抚河、信江、修河构成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向

心水系,通航便利。大庾岭开辟,中原与岭南经此往来。

景德镇是手工业市镇,聚佣者万余人;樟树镇是以药材加工贸易为主的工商业市镇;河口镇位于铅山河与信江交汇处,开设槽房,纸号栉比,纸业生产贸易为首项生业,又是沟通三省内河商运之要道,舟车四出,商贾所聚;吴城镇是水陆转运码头,江西、广东货物经此运销。九江是长江中游重要商埠,大余县城为过大庾岭之中转地,两地转运贸易发达。

九、湖广

湖广七山一水二分田,江汉、洞庭平原是本区水土资源最丰富区域,元末明初,中下游省区大规模移民,两处平原因劳力得到大量补充而得以进入大开发阶段,南宋后期出现的垸田(即围湖筑垸开垦之田)进一步发展,江汉平原尤著,(承天府)潜江县万历中有100余垸,沔阳州也有100余圩垸,“大者轮广数十里,小者十余里”。^{②③}人均耕地面积成倍增加。水稻品种改良,种植面积扩大,湖南基本上只以水稻为水田作物,粮食总产量增加,余粮率较高。便利的交通条件,远低于江南的人口密度,促成大批余粮外运,“湖广熟,天下足”在这一时期基本实现。西部山区属山地种植业,有的地方还在刀耕火种,以麦类、杂粮等旱地作物为主,因交通不便,即使粮食有余或不足,也与外界罕有交流。

湖广是南方主要产棉区,五府22州县植棉,号为江花,“江花出楚中,棉不甚重,二十而得五,性紧强”。^{②④}主要分布在鄂西、鄂中一带(汉水流域与长江两岸),以承天府的景陵、潜江、沔阳,德安府的应城,黄州府的蕲州、罗田,荆州府的归州所产为多。手工业不发达,棉麻纺织业与棉麻产区基本相合,以自种自织的家庭副业为主要生产形态,德安府应城县,“男女恒织木棉花为粗布,贸之四方,以聊生耳”。^{②⑤}外销棉布少,有贩运广东的咸宁大布、贩运江西的罗田布与孝感布等,另有少量棉花外运江南。

汉口处江汉交汇处,作为湖广漕粮交兑地及万历盐法改革后的楚商行盐总口岸,此时开始发展。沙市地处荆江要隘,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发展了中转贸易,四川木材、江淮食盐、湖广粮食、滇黔铅铜充斥于市,市半商贾。

十、福建

福建人多地少,虽尽力垦殖,“闽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可谓无遗地矣”,^{②⑥}仍不足于耕;经济作物种植业发达,又挤占了部分种粮用地;番薯、玉米的作用则刚刚开始发挥。粮食短缺日益严重,沿海四府最为典型。山区发展高田引水灌溉,粮食生产有所进步,人口少,自给之外,闽江上游地区还向福州输送大米。

蔗、果、染料、苧等经济作物种植业发达。沿海河谷平原区种蔗历史悠久,漳泉、兴化多蔗园,山区也有小规模生产。染料作物蓝靛、红花、紫草分布广泛,产量在全国居相当地位。果品种类多,荔枝、龙眼、柑桔、柚子最著名,质佳产丰。山区经济林木松、杉、毛竹、油桐等种植较多。本省植棉条件差,所产棉花质量很次,种植由盛入衰,只有少量生产,但苧、葛种类多,产量大,足以提供纺织原料。

丝织技术精湛,漳州不仅有名闻天下的漳绒、漳缎,还可仿制欧洲天鹅绒;福州的“改机”使织锦缎工艺甚至超过江南。棉纺织业有一定规模,但产量有限,原料主要取给于江南,“糖去棉花还”。麻纺织业普及,葛布、苧布是农家主要衣料,自给自足明显,惠安北镇布为精品。制糖业广泛分布,技术改进,榨糖法、白糖提炼、冰糖制造皆达到高超的工艺水准,糖品多,产量大。竹纸制造业在全国占重要地位,顺昌之纸行天下。陶瓷业遍及全省,以德化为著。

福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海上交通便利,陆路出省困难。福州、漳州、泉州是主要工商业城市,也是主要港口。隆万开禁前,中琉贸易盛极一时,福州为重要口岸;开禁后,月港兴起,福州衰落。闽商贩运东西二洋,获利颇丰。

十一、广东

珠江三角洲土地肥沃,耕作技术先进,粮食单位面积产量高;但本区废稻艺桑,广种经济作物,造成粮食总产下降。粤北丘陵山区和高雷高亢地形,修建陂塘,多用水车,蓄水灌溉,粮食生产比较稳定。海南大多数地区生产落后,以五指山为中心的黎族地区仍刀耕火种。海南粮食仰给大陆,珠江三角洲靠广西供应。

珠江三角洲在明中叶后逐渐发展成商品性农业生产基地,出现大片果林、蔗园,(顺德)陈

村是果木种植专业区域;万历中,桑基鱼塘发展较快,顺德、南海蚕桑业发达,“蚕壮鱼肥桑茂盛,塘肥桑旺茧结实。”其他地区也有不少重要经济作物,如海南的槟榔、椰子,高州的葛,粤北的桐、漆树。

广东手工业发达,冶铁、陶瓷、丝织、榨糖等相继进入鼎盛时期。佛山为全国著名的冶铁业中心,冶铁作坊规模宏大,组织有序,从业者以千万计,生产技术提高,产品种类增加,铁锅、铁线为主要产品,“每岁浙直湖湘商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②7}制糖技术不断改进,榨蔗工具日新月异,尤其是明中后期发明的糖车可以利用畜力轧蔗,使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所产糖品种类繁多,产量丰富,在输出产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广东濒临南海,海上交通发达,陆路以梅岭商道连接中原;境内东、西、北江贯流,河网纵横,交通便利。粤商为著名商帮,主要从事海上贸易、长途贩运。广州、佛山为重要工商业城市,广州同时也是重要外贸口岸,冬春两季定期举行中外商人的贸易交易会,开市期各数周之久,濠畔、高第、卖麻等街,商民绸缪;循北江南下之船,必先抵佛山而至广州,佛山为广州之外港,且手工业发达,商贾丛集,几“万余家”。

十二、广西

桂西少数民族地区,耕作技术仍处在粗放阶段,撒种于地,仰成于天,“至于平原旷野,一望数十里不种颗粒,僮人所种止山衡水田,十之一二耳,又多不知种麦粟,地之遗利可惜也。”^{②8}中部、东部的河谷盆地,普遍修筑陂塘堰坝,或架设水翻车筒,发展水利,增加作物品种,逐渐推广双季稻,虽田亩瘠薄,但相对的地旷人稀,使稍有余粮。更重要的是,广东存在大量的米谷需求,广西存在强烈的资金需求,致使广西竭力往广东输出米谷,岁数十万斛。

手工业生产规模、生产技术皆有长足进步,最为突出的是农副产品加工业。葛麻种植普遍,有麻纺织业;木棉树时可见到,壮锦颇有名气,玉林还出现了专以织布为生的散机户;种植甘蔗,有榨糖业,桂林用畜力榨糖以提高工效;粮食多,酿酒业发展;造纸从业者多,地方也多。它们多属于家庭副业(散机户所从事的也许称得上专业化生产),产量少,商品率低,原料与产

品之间交换也少。采矿业发展较好,南宁产金、铅、水银,梧州产铁,矿产品是外销第二大宗。陶瓷输入甚多,大藤峡对下水商船依大小榷以瓷器。

主要河流郁江、桂江、柳江依次注入西江,形成两广之间便利的水上交通网。

十三、四川

元末明初,四川盆地中西部曾大力推行屯田,但成效不大,水稻基本上仅限于宋代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盆西区(清代乾嘉中,四川盆地的水稻才开始大规模种植);全省大部分地区以冬小麦、黍、粟为旱地重要粮作。粮食生产发展较慢,但尚可自给。

盆地的川江、沱江、清江沿岸为棉花主产区,万历中,全川棉花种植面积达29万亩,居全国第二;蚕桑产量亦可。棉纺织业、丝织业、榨糖业因本省可自给原料而得到发展,沱江流域为棉布生产中心,成都是西南最大丝织业中心。四川负担繁重的征调任务,棉花岁70389.024斤,棉布岁160308匹,生丝岁6640.3341斤(遇闰7193.8428斤)。^{②9}因此,棉花、生丝、棉布除自给外,难有余裕,惟生丝有少量外销之记录。宋代比较发达的麻纺织业因麻产区萎缩而式微。西南山区为重要林木产地。

崇山环绕,长江航线滩险相接,对外交通十分困难,影响商品对外交换。

十四、云南

云南属高原省份,山原辽阔,占总面积的90%,平坝河谷只占6%。汉人主要居住在坝区,兴修水利,普及牛耕,推广精耕细作农业,平坝稻作得到显著发展。少数民族人口主要集中在山区,他们原以狩猎、畜牧为主,此时已更多地从事农耕。有些地区的种植业已接近内地水平,陇川江边高黎贡山麓“坡间如盘膝为田”,^{③0}垦山为田,种植水稻;但大部分地区耕作技术仍较落后,丽江府三年一获,滇西独龙等地区还处于原始游耕状态。山区主要粮食作物是低产的荞、稗、黍、秫等,万历中才开始引进玉米、马铃薯等耐寒高产作物。因此,云南长期粮食不足。

秦佩珩比较了云南方志与宋应星《天工开物》,认为占全省80%的腹里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已基本达到全国水平。永昌府匠作工巧,胜于内地;丽江府出产铜器、羊毛织品,备极

精美。但手工业生产规模十分狭小,只有零星生产。

云南为金银宝货之地。有银矿 23、铜矿 20、铅矿 4,银、铜产量均列全国首位。丽江出金银、名马;孟养出琥珀、宝石。出矿之处,“商贾则酤者、屠者、渔者、采者,任其环居矿外”。^{③1}矿工以一日矿砂之入博一日衣食之资,形成一个消费市场。可与之相比的是普洱茶区,“入山作茶者数十万,茶客收觅远于各处”。^{③2}矿区、茶区属专业化生产区域,生产者密集。

云南多江河,但滩多流急,难以行船;陆路则海拔高,起伏大,道路简陋,车马不便。

十五、贵州

贵州与云南同处云贵高原,岭谷相间,地形崎岖,气候恶劣,俗谚云“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多雨则涝,无雨则旱。一半以上地区居住着少数民族,“波耕水耨”,耕作落后,其田因靠天吃饭,号称“望天田”。汉人迁入坝区,兴修水利,普及牛耕,使之成为本省重要农业区。全省范围内粮食生产长期无法自给。

铜仁府、黎平府、普安州、乌撒卫、石阡府、龙里卫等处产铁,因有采铁冶铁业,有专门工匠打制生产生活用具;棉、麻少量生产,因此有相应的棉麻纺织业,黔东南族织锦具相当水平;造纸之处颇多,但基本上只是手工劳动状态下的家庭副业。生产零星,只能满足部分需求,生活资料大量依靠省外调剂。

乌撒、毕节、水西一带出良马,岁输 6 000—7 000 匹,可换回布 18 万匹或盐、茶 60 万斤(1 匹马换布 30 匹或盐、茶 100 斤)。清水江、乌江、都柳江、赤水河、北盘江流域产木,以清水江苗杉为著,采伐后顺流输出。“土产则水银、辰砂(产自铜仁、思州等府)、雄黄;人工所成,则缙皮为器,饰以丹朱(即成漆器),大者箱柜,小者筐匣,足令苏杭却步”。^{③3}水银、辰砂、雄黄、漆器等输出量不大。

贵州多河流,但不宜通航,大部分地区地形闭塞,交通不便。明初,土司奢香主持开辟了通往四川、云南的道路;思南、石阡之间,水陆并行,联系川贵。

从商业定义与商业功能出发对 商业水平的不同评价

虽然无法对市场上商品流通的数量和金额

进行准确的计量分析,但是通过上述的描述性语言,至少可以看出:明代中后期,多数省区的商品流通均已达到一定规模,且不论农业手工业生产比较先进的江浙闽广地区,连粮食尚且不能自给的云贵、生产水平明显落后的北直隶与陕西山西一带,商品交换的数量也不可小觑。在这些地方,商业水平甚至已经超过了工农业生产水平。

北直隶商业因为北京与宣蓟边镇庞大的消费需求以及宣蓟边镇的互市贸易而具有相当规模。宣府、蓟州驻军 24 万余人,岁拨饷银 355 万余两;而北京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仅宝和六店一年就出售商品数百万两。仅此数处,北直隶的商品流通额就可以千万两计。山西边镇岁饷 200 万两,又有互市贸易;更重要的是,晋商是当时执中国商业之牛耳的著名商帮,为山西源源不断输入雄厚的资金,仅从购买力水平考虑,山西商品购销足可想见。九边重镇,陕西有其四,延绥、宁夏、固原、甘肃各镇的官市市本、抚赏金与岁饷数百上千万。云贵自然条件恶劣,连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也难以继,但它们可以用金银宝货交换基本生活必需品,活跃着大批外来商贾,据称仅姚安府就有江西安福、浙江龙游商人三五万,孟养宣慰司的江头城外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也有数万之众。^{③4}

然而,在对明代中后期商业水平之高表示无可置疑之余,还应该从商业的实际功能出发,对实际商业水平进行另一番考察。通过对资料的仔细解读,可以将其时的商业分成三种形态:

第一种,直接服务于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商业。江浙闽广,经济作物种植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形成棉作与棉纺织业、蚕桑与丝织业等专业化生产区域,相关部门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家庭副业的范围,南直隶的棉布、浙江的丝织品、广东的果品、福建的糖,生产量都很大,足以为社会提供充裕的产品。生产分工细致,棉花生产、纺纱、织布是分离的工序,栽桑、养蚕、缫丝、纺织也是相分离的,江南有蚕桑、蚕茧、棉花、棉纱等专业市场,乌镇为桑叶集散地,鹤王市为棉花市场。从而在区内区外形成各级原材料与粗加工产品之间、粮食等生产生活资料与手工业产品之间的频繁交换,松江

布业、苏州丝织业的年流通额都以数百万两计,国内生丝供应大多来自湖州,福建、广东、南直隶都有输入大量米谷的记录。此外,江西景德镇的瓷器、铅山的纸业,山东的皮毛加工,山西的铁冶,也比较突出,也出现了比较频繁的原料输入、产品输出过程。

在农业、手工业生产进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业,与行业分工紧密联系,属于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这种商业形态,可以有效实现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便利补给,实现产品销售,更好地促进区域分工与合作,实现规模效益;并且形成一定的力量,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技术水平。

第二种,为简单再生产服务的商业。无需讳言,其时的中国,大部分区域仍然处在自给自足的生产形态之中:生产粮食,余粮外运;生产棉麻,供给家庭副业;手工业基本上属于家庭副业的范畴。初级市场发育比较明显,农村墟集上进行着频繁的商品交换,小生产者或者自己直接到市场上进行产品交换,或者通过商人实现劳动的交换。通过商业的润滑,一个个简单再生产得以重复进行。

这种商业形态是吴承明先生“广义自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者通过商人互通有无,实现生产生活资料的交换,使再生产得以顺利完成。另一方面,这种商业形态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产品供给相对有限的条件下进行的交换,是一种低水平的简单重复过程,它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巩固小生产方式的作用。

第三种,为生活消费服务的商业。这种商业形态在两类地区表现突出,一是生产最为落后的云贵地区,粮食、日常生活用品等民生所需均极匮乏,靠金银宝货、名马大木之类来交换,是一种十分落后的商品交换形态。二是北直隶等生产比较落后、自给自足特征明显的省区,其商业的突出特征是:财政资金的投入与商业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财政资金是最为强劲的购买力来源。北直隶商业是典型的单向流动,是全国向北直隶输送商品的一个过程。这种商业没有参与生产资料的交换活动,纯粹为生活服务。

可以将各省区三种商业形态的地位作一简

单比较:第一种商业形态占相对优势的,包括南直隶、福建、广东、浙江四省区,它们同时也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第二种商业形态占主体的,包括山东、江西、湖广、四川、广西,其工农业生产水平相应处在第二层次;第三种商业形态比较典型的,包括北直隶、山西、河南、陕西、云南、贵州,其工农业生产水平最低。由此可见,为扩大再生产服务的商业在整体商业中所占的比例还相当有限,为简单再生产或生活消费服务的商业仍是商业形态的主体,商业的主要作用仍然停留在《盐铁论》时代的调多寡、散财用之上,“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疏食。天地之利无不赡,而山海之货无不富也,然百姓匮乏,财用不足,多寡不调,而天下财不散也。”商业在实现资源配置、协助完成生产过程等方面的作用相对弱化,这种“繁荣”的商业实际上又是一种低水平的商业。因此,这种甚至凌驾于工农业生产水平之上的商业,其于社会经济的贡献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

首先,商业领域吸引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使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受到资金等因素的制约,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不可否认,商业也是生产劳动,而且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商业活动只是与物质生产过程相关的劳动,它本身不能创造物质财富,只是通过媒介作用来帮助实现社会物质需要的满足。而农业、手工业是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部门,其生产活动能够创造价值,能够生产物质使用价值,于社会财富的积累至关重要,这也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商业活动,可以调剂物质的流向,但不能增加物质的数量,尽管多数情况下名义价值形态上的货币收入量会有所增加。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生产力不发达、经济短缺、社会物质财富需要极大增长的条件下,物质生产应该是经济发展的重点,商业与工业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相比,应该处在一种从属的位置,一种相对次要的位置。^③

从各省区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明代中后期,商业与物质生产过程的相关度甚至不如与日常

生活的相关度。商业的主要目的在于从流通领域中赚取利润,而不是为生产服务。货币成为流通的目的,商品成为流通的媒介。这种商业属于低质服务业,它对增加物质生产能力的的作用相当有限,而且,由于从商者众、市场发育,产品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环节复杂化,不少商人靠转手交易赚钱,人为拉长流通的经济距离,反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然而,明中叶而后,商业利润的诱惑,使弃农经商、弃工经商者日众,“竞贾贩锥刀之利”蔚然成风,商业领域集中了大量资本和众多资源。商品流通领域的优厚利润,助长了浮华求富的心理,自愿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手日见减少;也促成了向商业部门加大投资的趋势,阻碍了产业资本的发展。在正常状态下,随着要素投入的不断增长,生产不断进步,社会财富的创造速度逐渐加快,满足基本消费需求的商品供应范围不断扩大,即使积累的速度相当缓慢,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将朝着良性的方向不断迈进,而过度膨胀的商业将使这一过程延长甚至中断。

其次,由商业利润积攒的巨额财富,也没有有效转化为产业资本,最大的用处可能就在于满足商人穷奢极侈的生活享受。商业利润的主要去处包括:继续用于商业活动,转化为土地资本,窖藏,用于宗族消费,等等。投资在生产领域的只是其中极小的部分。充裕的金钱,造成社会的侈靡之风,至如苏州的家居摆设,足令后世瞠目,“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于匡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璧之锻,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亦为俗蠹。”^{③⑨}商人尤为奢侈者之中坚,“天下都会所在,列屋连肆,乘坚策肥,被绮縠,拥赵女,鸣琴踰屣,多新安人也。”^{④⑩}发达的商业带来的巨额财富就体现在这些地方,其于社会经济的贡献当可想见。

注释:

吴先生将自然经济的含义分为四层:一、一个家庭的自给自足,自耕农的富裕户最有可能达到。二、为自

己和剥削者的直接消费而生产,即以劳役地租、实物地租的形式提供生活资料。三、自我完成再生产的经济单位,生活、生产资料基本上由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提供。四、广义自然经济。与广义自然经济颇为接近的是施坚雅称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是与四邻隔绝、自给自足的区域混成制社会(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214页)。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蚕桑广类 木棉》。

《万历会计录》卷18—23。

嘉靖《宣府镇志》卷20,《风俗考》。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粒》。

万历《东昌府志》卷2,《地理志 物产》。

万历《兖州府志》卷4,《风土志》。

万历《汾州府志》卷2,《风俗》。

万历《平遥府志》卷29,《风俗》。

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

⑪民国《偏关志》卷上。

⑫谢肇淛:《五杂俎》卷4,《地部二》。

⑬钟化民:《赈豫纪略》。

⑭嘉靖《兰阳县志》卷2,《田赋志》。

⑮参见本人博士学位论文《万历商业税收研究》,厦门大学历史系1999年,第52页。

⑯《神宗实录》卷140,万历十一年八月条。

⑰天启《渭南志》卷5,《食货志 物产》。

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84,《浙江二》。

⑲万历《杭州府志》卷33,《城池》。

⑳天启《赣州府志》卷2,《物产》。

㉑万历《江西省大志》卷7,《陶书》。

㉒万历《南昌府志》卷3,《风俗》。

㉓嘉靖《沔阳州志》卷8。

㉔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蚕桑广类 木棉》。

㉕万历《湖广总志》卷35,《风俗志》。

㉖谢肇淛:《五杂俎》卷4,《地部二》。

㉗《明经世文编》卷369,霍与瑕《上吴自湖翁大司马》。

㉘王士性:《广志绎》卷5,《西南诸省》。

㉙《万历会计录》卷10,《四川布政司田赋》。

㉚《徐霞客游记》卷8。

㉛王士性:《广志绎》卷5,《西南诸省》。

㉜谢肇淛:《滇略》。

㉝王士性:《广志绎》卷5,《西南诸省》。

㉞参见张海鹏《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

㉟参见胡培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争论之我见》,《中国经济问题》1988年第6期,第1—8页。

㊱王士性:《广志绎》卷2,《两都》。

㊲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13,《白庵程翁八十寿序》。